

一个母亲20年跨越生死的自白，在告别之后，
她朝孩子隐秘的内心走去，学着真正了解与原谅。

A MOTHER'S
RECKONING

谜一样的孩子

〔美〕苏珊·克莱伯德 著 〔美〕花一城 译



A MOTHER'S
RECKONING

谜一样的孩子

〔美〕苏珊·克莱伯德 著 〔美〕花一城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谜一样的孩子 / (美) 苏珊·克莱伯德著; (美) 花
一城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9

ISBN 978-7-5596-2319-5

I. ①谜… II. ①苏… ②花… III. ①纪实文学—美
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5543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8-4484

A MOTHER'S RECKONING: Living in the Aftermath of Tragedy by Sue Klebol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rown Business, 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谜一样的孩子

著 者: [美]苏珊·克莱伯德

译 者: [美]花一城

责任编辑: 郑晓斌 宋延涛

产品经理: 康爱爽

特约编辑: 王云欢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64千字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1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2319-5

定价: 46.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前言

几乎从科伦拜恩枪击案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我便开始记录这段经历。写作是我处理悲剧的方法之一，于是我记下了儿子恶魔般的罪行——无辜生命的丧失以及他的自杀。我从未有意识地去创作。写作，对我而言如同呼吸，是生命的一部分。

拿这些文字怎么办，是很久以后才做出的决定。最初，我认为自己内心不会强大到敢于公开发表对迪伦和我们家的看法。我很害怕我分享个人的故事和思绪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被视为对受害者的不敬，或是迫使社区成员和亲人重温科伦拜恩枪击案那惨痛的回忆。我不想再收到如山的仇恨邮件和媒体的轰炸，因为任何人都无法经受住第二次打击了。

直到数年后，我才与一家出版商签约，接着完成书稿。距离《谜一样的孩子》一书问世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为了推广，我还得在媒体上露面。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兔子，即将在众目睽睽之下从空旷的草地上飞蹿过去。

最终，我之所以能跨出这一步，是因为我所希望传达的信息是生死攸关的议题。我深感责任在肩，必须与父母和其他家人分享所发生的事件和缘由。我相信讲述迪伦的经历对他人会有益处，尤其是那些身陷绝望的循环之中，正在苦苦挣扎的人。我特别想让读者知道，任

何人都可能遭受痛苦的折磨，他们需要专家的关注、帮助或是治疗，无论他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或他们是谁。作为一位母亲，当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为时已晚。面对世人，当事人显得安然无恙，他们的成功和成就的背后，可能掩藏着无言的痛楚。

迪伦就是这样，他被爱他的家人和朋友包围着，跟他亲近的人都觉得一切安好，然而真相并非如此。

科伦拜恩案件是一场史诗级的悲剧。隐藏的痛苦也会通过高危的行为表现出来，或是致使受折磨的孩子和成人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这些不幸司空见惯，然而却是可避免的。如果当初迪伦的亲友中，有人能辨识出他正在经历着痛苦，我们是可以介入的，并提供给他所需的救助，帮助他度过危机期。那么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他的判断力受损，不由自主地痴迷暴力，被误导以至于失去人性，最终导致他杀害同学和教师，继而自杀身亡，都可以避免。

科伦拜恩枪击案过去多年，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人们更愿意将“行为健康”作为健康的一部分来考量。自从悲剧发生以来，我目睹了一些方面发生的巨大改进，包括心理保健、学校政策、对枪击案的积极应对和预防自杀等等。越来越多的人承认暴力行为，无论是如科伦拜恩案件一样的大规模枪击案，还是较小规模的情况，都是有可能被防范的。一个人迷失了方向，并非本质上是坏人。对死亡和自杀有持续的念头是病态的症状，并非人格上的缺陷。

《谜一样的孩子》出版后，受到了读者和媒体真诚而积极的回应，对此我打心眼儿里又惊又喜，充满感激。我最担忧的是这本书会重新激起愤怒和痛苦的风暴，再次撕开1999年4月的伤口——还好并没发生。我经常从读者那里听到的反馈是：“谢谢你分享自己的故事。”很多家长都说，读后，他们从新的视角去看待自己的孩子，倾

听孩子的心声，也更仔细地研究他们的心理。有些人还认为每个家长都应该读读这本书，更有人与我分享他们精神上的挣扎和自杀的念头。这本书使得他们头一次意识到如果真的自杀身亡，亲人将会陷入怎样绝望的境地。我所听到的这些呼声，反映了针对思维混乱、酒精毒品成瘾、行为障碍及其他脑健康问题的患者，在改善护理和治疗方面的需求。这些需求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强烈。

这本书的出版还带来另一份意想不到的祝福：科伦拜恩悲剧的几名幸存者主动与我取得了联系。有机会与他们见面，让我感到很荣幸。他们的宽容和大度，令我自愧不如。能与迪伦的受害者或他们的家人真诚地彼此拥抱，这在枪击案发生之初，简直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感激万分。

自这本书发行以来，我更多着重在参与全国范围的活动，本地的志愿工作大幅减少了。这些活动旨在提高学校、医护者和媒体人员在精神健康方面的水平，我会在其中公开发表演说。让我讶异不已的是这本书还引起了全球读者的关注——我从未想过，美国之外还会有人对如此艰涩的主题感兴趣。到目前为止，本书已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包括匈牙利语、意大利语、荷兰语、德语、法语、韩语、汉语、葡萄牙语、俄语等等。全球范围感兴趣的程度证明了精神健康是一个人们普遍关注的议题。

我还有幸能够将本书的收入捐献给致力于预防自杀、循证医学项目和大脑健康研究的组织。如果没有本书的出版，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些组织尽心尽力，值得为之加油。

在灵魂不断求索科伦拜恩案件的答案的漫长时光中，有一桩事情始终未曾改变，那就是我对迪伦的感情。对他一如既往的爱是我得以坚持写作和活下来的力量，也是我得以专注于所支持的事业的原因。

无论睡梦还是醒来，他都安息在我的心怀。我想象着他陪伴我一起走过绵绵岁月，一起讲述我们那让人心碎的故事。我多么希望当时能像现在这样明了诸多事实和知识资源，能在迪伦需要我的时候更好地帮助他，那么，许多生命都会因此而安然无恙。这样诚心的祈愿，会一直延续，直到永远。

苏珊·克莱伯德

我们会习以为常地把孩子展现出来的缺点归因于他们的父母。18世纪的“想象主义”甚至认为，先天畸形的孩子都是母亲淫荡的渴求得不到满足的结果。到了20世纪，同性恋被认为是母亲对孩子过度专注和父亲的消极角色而导致的；精神分裂症则反射了父母潜意识里希望孩子并不存在；至于自闭症，归咎于那些“冰箱式母亲”，她们的冷漠使孩子沉默不语。如今我们了解到，这些病况起因复杂，影响它的因素也是各式各样的，不能归咎于父母的态度和行为。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如果进入一个杀人犯的原生家庭看个究竟，就可以一眼看穿其父母的失误之处。“孩子的行为是有迹可寻的”这个观念是社会公正的标志，同时也一直引领着我们为失足少年寻求精神康复，而不是直接惩罚他们。根据这个逻辑，一个成年人作恶，怕是没救了；可一个孩子做了坏事，或许只是受了负面影响的结果，是家庭养育不当的产物，源头不在于无法逆转的天性。

未成年人犯罪是父母没做好教育的缘故，社会对此见解紧抓不放，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严重的虐待和忽视确实会激发性格脆弱的人做出某些变态的行为，这是毋庸置疑的。养育不当也会将孩子推向吸毒、结交黑帮、家暴和盗窃等深渊。由于年幼时受到的摧残，他们会对他人有强

烈的依赖性，并且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强迫重复着成长过程中经历的无助和愤怒。有些父母确实毁了孩子，但并不是所有惹麻烦的孩子的父母都是无能的。特别是极端的、毫无理智的犯罪行为往往与父母的行为并无关联。这些行为可以归因于缺乏逻辑原理，其中的深奥远远不止曾经遭受过心灵创伤这么简单。

第二，更有说服力的是，我们“想要”相信是父母“制造”了这些未成年罪犯。如果这个假设成立，我们就能安慰自己，在自家的屋檐下，我们遵纪守法，这样的灾祸就不会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我现在意识到，这种想法纯属错觉。

2005年2月19日，我第一次与汤姆和苏珊·克莱伯德见面，我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能迅速发现他们是哪里做错了。彼时，我正在写一本名为《那些与众不同的孩子》（*Far from the Tree*）的书，是关于父母与难对付的孩子的。于是在我想象中，这对父母绝对是个典型，在抚育孩子的过程中一定错误连连，罪责难逃。我也真诚地认为他们的经历能够阐明其他数不清的显而易见的错误。我本不想对克莱伯德夫妇有好感，因为如果我对他们心生好感，那么相应地，就得承认发生的悲剧不是他们的过错。如果不是他们的错，那么我们这些父母，谁也安心不了。出乎意料，我与他们非常投缘，以至于分别时我脑海里有个念头——科伦拜恩枪击案背后的心理因素是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家庭里的。甚至，类似的悲剧好比海啸一般无法预见或察觉。无论如何做到有备无患，都是徒劳。

根据苏珊·克莱伯德的叙述，科伦拜恩惨案发生之前，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住在郊区的母亲。我们那时素不相识。惨案发生后，她最终坚强起来，从绝望中汲取了智慧。在这样的状况下还能坚定不移地去爱，完全是勇气的表现。我很荣幸能够了解到她的慷慨和热情；

她充满活力地爱别人，能对别人施以真挚的关注。这一切，反衬得那起惨案愈加让人伤痛和迷惑。起初我猜想，克莱伯德夫妇肯定是对他们的孩子不闻不问。结果我意识到，孩子处心积虑地策划惨案，远远不是缺乏父母的爱能够诠释的。这本书的每一页都透露出苏珊对儿子深切的爱，同时也证明了这起惨案的复杂性。她认为好人也会做坏事，我们每个人在道德上都会有迷失；并且即使做了坏事，也不能全盘否定他们的其他行为和动机。这本书的终极信息让人心生恐惧：你可能根本不了解你的孩子；更糟糕的是，你的孩子可能对你隐藏了自己。你所害怕的“陌生人”可能会是你的儿女。

“我们给孩子读童话，教导他们这个世界有好人也有坏人。”在我写《那些与众不同的孩子》这本书时，苏珊跟我谈心时说道，“我再也不会这么做了。我会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做好事，也有可能做出不好的选择。如果爱一个人，就要去爱他好的一面，也要去爱他坏的一面。”在科伦拜恩时，苏珊的办公室跟假释局在同一幢办公楼里。在电梯里遇到那些有犯罪前科的人时，她总是会感觉距离很远，心里也害怕。惨案发生之后，她的视角转变了。“我感觉他们就像是我的儿子，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只是被扔到了一种可怕、无助的境地。从收音机里听到恐怖分子的消息时，我也想，‘那也是某个人的儿子啊！’科伦拜恩惨案使得我与全人类有了前所未有的关联。丧亲之痛，能够使得伤痛中的人对他人产生丰富的同情心。”

两种类型的犯罪行为最让我们痛恨：孩子是受害者，以及孩子是始作俑者。第一种情况下，我们为无辜的孩子哀伤；第二种情况令我们不能理解，因为孩子本来应该是纯真无邪的。校园枪击案是最让人惊心动魄的，因为这种事件同时涉及了以上两类。在校园枪击案中，科伦拜恩事件又一直是被作为典型来看待的，是步其后尘的案件的终

极典范。埃里克·哈里斯和迪伦·克莱伯德思想里的极度自我主义与施虐的欲望混杂，枪杀目标的随意性、前期的精心筹备，都使他们在大批年轻的叛逆者心中被当作英雄来看待。大部分人都坚定地认为他们心理不正常，一些宗教群体还认为是典型的撒旦主义在作祟。人们不愿悲剧重演，想保护自己的孩子，于是一遍遍地分析这两个男孩子的动机和目的。最有勇气的父母也在考量，如何才能确保自己的孩子不会犯下这样大的罪行。古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科伦拜恩事件是突如其来的最为严重的一场浩劫，并且事前在光天化日之下，隐藏得密不透风。

要想彻底了解一个凶手是不可能的。我们身处在人人互相指责的社会，有些受害者的家人为了获得“隐藏的答案”而殚精竭虑。凶手的父母真的毫不知情，否则一定会加以制止，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杰斐逊县的法官约翰·德维塔就这两个男孩子发声：“让人绞尽脑汁的是他们的欺骗量之大，欺骗手段之容易，而且欺骗之冷静。”大多数父母都认为比孩子自己还要了解他们，殊不知，孩子有意要将内心的自己掩藏得严严实实。受害者家人为此案起诉是基于他们认为，人性是可知的，内心的逻辑是可以监控的，惨案的发生是有迹可寻的。萨特曾经说过：“邪恶并非从外表可见。”又说，“了解缘由不等于能够避免邪恶的发生。”这样看来，在惨案发生的丹佛郊区，没有多少人好好读过萨特。

从两名枪手的表现分析，埃里克是一个具有杀人倾向的精神病患者，迪伦则是一个具有自杀倾向的抑郁症患者，他们的不同之处都是彼此走向极端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埃里克的领导能力，迪伦的抑郁情绪不会上升为谋杀念头。与此同时，如果不是拉着迪伦一起下水的刺激推动着埃里克，或许他内心的动机也会慢慢消亡。埃里克的凶神

恶煞让人震惊，同样让人震惊的是迪伦对其的默许。迪伦曾经写道：

“想到自杀，能给我带来希望，从而到达一个属于我的地方，不再与自我、与世界、与整个宇宙争战；我的意念和身体会彻底得到平静——我——我的灵魂，”他是这样描绘自己当时状态的，“在没完没了的现实里、无休无止的方向中，经受着永恒的痛苦。”他文字中最常出现的词是“爱”。埃里克却写道：“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同一类生物，我们完完全全不同……你不是人，是机器人；假如你以前得罪过我，让我看见你的话，你就活不成了。”他的日记里写了想象中未来的大学生活，他会引诱女孩子到他房间强奸她们。又写道：“我想象拉易拉罐一样撕裂人的喉咙。我想像一只狼一样揪住一个小新生，让他们瞧瞧到底谁是上帝。”埃里克是失败的希特勒；迪伦是没成功的霍尔顿·考尔菲德¹。

苏珊·克莱伯德强调了儿子迪伦身上的自杀倾向。卡尔·门宁格写了大量关于自杀的文章，他说自杀需要三个方面吻合才能成功：“杀戮的愿望、被杀的愿望，以及死亡的意愿。”其中“杀戮的愿望”不见得总是对外的，却是自杀“拼图”之中不可或缺的一片。埃里克想杀人，迪伦想死，两人都认为他们的体验里含有神圣的意味，因为二人都写过，这场屠杀惨案最终会如何将他们带到上帝面前。他们的行为思想既有炫耀的成分，也显得幼稚，与普通青少年是相似的。在科伦拜恩高中的公共区，在他们屠杀末了，一个躲在学校餐厅的目击者听到他们俩其中一个说：“今天世界即将结束，今天就是我们的末日。”这是一个将自己与他人混为一谈的孩子气的说法。G.K.切斯特顿曾经写道：“一个人杀死了另一个人，只是毁了一个人；一个人如果杀了他自己，就杀死

1 《麦田里的守望者》男主角。

了人类。对他自己而言，他毁灭了整个世界。”

精神疾病的维权者指出，大多数罪行不是出自精神病患者之手，大多数精神病患者也不会犯罪。那么，如果认为科伦拜恩惨案不是精神病导致的祸患，这样的说法对于现实有什么意义？人们对犯罪行为之所以抗拒，是因为人们要么知道自己会被抓住，要么已经学会了遵守道德规范。大多数人都见到过自己想偷的东西；大多数人的脑子里也瞬间闪过把自己身边最亲密的人给杀了的念头。然而，人一般不会去杀害学校里几乎不认识的孩子，同时将整个地方当作质押，并不是因为畏惧惩罚或是谨守着所接受的道德准则，而是因为正常的思维里一般不会有这个念头。尽管患有抑郁症，但是迪伦没有精神分裂症、创伤后应激障碍、双相障碍，抑或其他符合精神病诊断范畴的状况。他脑海中存有扭曲的想法，但是这不能降低他所作所为的狠毒程度。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没有试图为迪伦的行为追究缘由。苏珊拒绝指责学生之间的欺凌，拒绝指责学校，或者归因于儿子的生理化学测验结果。这一切都反映出，她是下定决心要去接受任何无法解释的事情。她也未曾尝试去诠释邪恶和疾病之间那永远混淆不清的界限。

惨案发生之后，一位来自芝加哥的木匠来到利特尔顿，竖起了15根十字架，包括迪伦和埃里克在内。许多人在迪伦和埃里克的十字架前堆满了鲜花，如同对待其他受害者一样。然而，另一位受害者的父亲布莱恩·罗尔博，除去了十字架上“哈里斯”（埃里克的姓）和“克萊伯德”（迪伦的姓）的字样。他说：“如此向凶手致意，贬低了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意义。《圣经》里不曾说应该饶恕一个未曾悔改的杀人犯；相反，《圣经》上明明白白地说：‘没有悔改，就没有饶恕。’”当然，对这段《圣经》准则的理解是值得斟酌的，而布莱恩·罗尔博的言辞如此肯定，是基于一个错误的想法，那就是

哀悼凶手就等同于饶恕了他们，而饶恕意味着遮盖悲惨程度。而事实上，苏珊·克莱伯德从未寻求，甚至从未想过人们会饶恕她的儿子。她只是解释，她事先毫不知情。同时，她也没有推卸责任，她认为自己的不知情，是对儿子和世界的背叛。罪大恶极的人确实该死，但是任何一个死去的孩子都是父母枯萎的希望。这本充满哀伤的书是苏珊对自己痛悔的表达。仇恨不能抹杀爱。实际上，爱和恨始终是相伴相随的。

我们第一次会面，苏珊就跟我说了她在1999年4月20日那天听到科伦拜恩高中惨案发生的那一刻。“利特尔顿的母亲们都在祈祷自己的孩子安然无恙，我却在祈求我的孩子能够死掉，不要再伤害另一个人。”她说，“我想到，如果这一切是真的，他还能从现场存活，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最后被判死刑。我没办法忍受两次失去儿子，我做了此生最艰难的祷告——祈求他自杀。因为那样起码我知道，他是想死的。假如他是被警察打死，那么我就要面对更多的疑问。也许我是对的，但是我又长时间地为这个祈祷而悔恨：我祝愿儿子自杀——他真的去做了。”

与他们会面的周末即将结束，我问汤姆和苏珊，如果迪伦此刻在屋里与我们坐在一起，他们有什么话想对他说。汤姆说：“我要问他，他到底在想什么，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苏珊盯着地板想了一下，低声说：“我要请他原谅我，原谅我作为母亲，不知道他头脑里出了什么问题，原谅我不能帮助他，原谅我不是他能吐露心声的那个人。”5年以后，我再次提起这个对话，她说：“事情刚发生时，我都宁愿从来没生过孩子、从来没有结过婚。如果早在俄亥俄大学，汤姆和我从未相遇，迪伦就不会存在，这件恐怖的事情也不会发生。但是渐渐地，我感到很高兴做了母亲，生了两个孩子。因为，对

他们的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喜乐，即使代价是如此深刻的痛。我这么说，是指我自己的痛，不是旁人的。我也接受自己的这份痛，人生充满痛苦，这是我的一份。我知道，对旁人来说，最好迪伦没有存在，可对我而言，没有过迪伦这个儿子，我并不会更好。”

一般来说，我们失去一个人是一次性的，但是苏珊的失去是一波一波的：先是儿子自杀身亡，然后是儿子在她心目中的形象，接着她又放弃了自己对儿子黑暗的一面有所认知的想法。接下来，除去“凶手的母亲”，她失去了本身的其他身份。最后，她放弃了基本信念：生活是有逻辑可循的，假若你做了一些正确的事，是可以避免某些不祥后果的。确实，拿哀伤与哀伤相比，没有什么益处；如果说苏珊的哀伤是利特尔顿最惨的哀伤，也不合适。然而，她困扰在两种痛苦之间缠结不清，无法解开：她发现自己从未了解过儿子的那种痛苦与看到儿子给别人带来的绝望和痛苦。她始终在几种悲伤中挣扎——儿子死去的悲伤，对其他遇害孩子的悲伤，以及未曾养育一个快乐的、对社会有益的孩子的悲伤。

孩子年幼时带来一些问题，我们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是一种令人兴奋的经验；当他们制造了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问题后，我们就会有巨大的挫败感。这本书就强烈地展示了这种常见的挫败和失望。苏珊描绘了自己想取悦别人的本能冲动，同时又清楚地说明，写这本书是需要放弃这个想法的。她的书是献给迪伦的，并不是为他辩解；她的书意在呼吁社会重视精神健康和研究。她把持道义，态度坚定，谨守尊严，因此苏珊到达了一个无法超越的孤独境地。她的经历独一无二，在某种程度上，这让苏珊不可理解，正如迪伦一样。在将自己的体验写出来时，她选择了不被大众理解。

奥维德曾表达过一个著名的教诲：“拥抱这样的痛苦吧，你将从

中有所学习。”然而，对于这样的痛苦，我们似乎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也没有不欢迎的选项。痛苦来临时，你可以表示不满，但是你不能叫它离开。苏珊·克莱伯德未把自己当作一个受害者抱怨过；可她的陈述回应着《圣经》里约伯的哭诉：“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也不受祸吗？”“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苏珊叙述了她如同约伯一样，坠入了深不可测的地狱。她在书中承认，即便站出来发声，哀痛也不得消减。这本书不是一具心脏支架，意在让她感觉舒服点。这本书只是一份记录，叙述她接受现实的过程，与心灵的争战，使得她能安放自己的痛苦，寄予一种希望：再也不要有人遭受她所遭受的痛苦、她儿子的痛苦以及受害者的痛苦。

安德鲁·所罗门

1999年4月20日，埃里克·哈里斯和迪伦·克莱伯德携带着枪支和炸药走进了科伦拜恩高中。随后他们杀害了12名学生和1名教师，致伤24人，最后两人自杀身亡。那是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校园枪击案。

迪伦·克莱伯德是我儿子。

我愿意牺牲我的生命去扭转那天所发生的一切，哪怕能换回一条生命。然而我知道，这样的交易是无法实现的。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都不可能丝毫弥补那场大屠杀所带来的重创。

那可怕的一天已经过去了16年（按：本书英文版出版时间为2015年），每一天我都在试图理解，一个有前途的男孩的生活是怎么演变成一场灾难的呢？况且一切都发生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我至今也理解不了。我追问家人、迪伦的朋友，追问专家，最重要的是叩问我自己。我忽视了什么，怎么会错过？我一遍遍翻阅日记，像法医、专家、学者一样穷追不舍地剖析我们的家庭生活，连琐碎小事和交流也不放过，试图找出自己错过的线索。我本应该注意什么？本该有什么不同处理方式？

起初，我寻求答案的过程纯粹是个人使命的驱使。强烈的羞耻感、恐惧和悲伤让我不知所措，同样强烈的是我对这些答案的渴求。然后，还有许多人渴望解决的难题，我看到自己逐渐掌握的碎片能够